

DOI:10.13718/j.cnki.xdsk.2014.05.018

[明清史研究]

主持人: 陈宝良

**主持人语:**本期所收两篇论文,均属中外关系史研究的范畴。宋玉波所撰之文,透过朝鲜燕行使中华认同观的递嬗,观中朝关系的内在变迁,尽管其内容尚不脱中朝关系的范围,却实在称得上符合当下史学界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新趋向;冷东、吴冬艳所撰之文,则通过对黄亚胜档案的系统梳理,进而剖析清代的文书制度,然其考察的视点所指,亦并不仅限于文书制度,而是涉及到清代中西贸易史的诸多问题。通过两文所论,已经清晰地揭示出,自清代以后,中华帝国在周边乃至世界的地位,已经渐趋衰落。中华文明的衰替,尽管1840年的鸦片战争可以作为明显的标志,然若细究之,实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华帝国号称天朝上国,世界的中央帝国,在文化上一向讲究“华夷之辨”。若以周边藩属的朝鲜、日本为例,大抵自清初以后,其中华认同观已经悄然发生转变,朝鲜燕行使节中华认同观的沦丧,乃至日本汉学家一致认定崖山之后,中华文化脉络已经中断的论点,无不说明“礼失而求诸野”已经成为一种事实。至于乾隆时期的中西礼仪之争,则只能说明帝国统治者的抱残守缺与鼠目寸光。换言之,明清两代中外关系史内在嬗变的事实已经证明,中华文明的重新崛起,必须基于世界性的视野之上加以创造性的转化。

# 朝鲜燕行使节中华认同观的递嬗<sup>\*</sup>

宋玉波,彭卫民

(西南政法大学 民族政治研究院,重庆市 401120)

**摘要:**燕行使节的中华认同观是明清时期中朝关系的风向标。研究以《燕行录》为代表的中朝关系史料,不难发现,奠基于礼学体系的中朝宗藩关系从明末便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朝鲜使节对明代的批判、对中华文化正统性的质疑便时有显现,其中华认同观也渐始减弱。明清易代后,朝鲜已不满足于“小中华”的自我定位,视满清入主中国为“鸠占鹊巢”而予以批判,有意识地区分出“他者”与“自我”并以正朔自居。总体而言,朝鲜中华认同观的变化是一种彼此渐行渐远的双向过程:自我意识日渐强烈,中华认同观因时递减,导致朝贡关系与自我身份认同背道而驰。

**关键词:**朝鲜王朝;燕行使节;《燕行录》;中华认同观;递嬗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4)05-0153-08

传统的东亚共同体实为以中华文化为统摄的文化共同体,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对中华文化服膺的认同政治,即受到中华文化辐射的国家既有对“宗主”与“自我”彼此间的定位,也有因地位上的差异却追求身份平等而产生的紧张;既有秩序上的认同,也有因国家间关系格局的差异而对现实持有的批判立场。朝鲜王朝(1392—1910)与明清中国的国家间关系,便绝好地刻画了这种认同政治所体现出来的双重面相。朝鲜作为东亚共同体中重要的成员,在朝贡体制中曾经发挥了“长子”般的表率作用,较之东亚的其他藩国,其中华情结更为纯洁、虔诚,而这种情结直接来源于它对大中华,特别是兴盛于唐、宋时代的礼教文明的认同。但这种认同到了16世纪便已经开始减弱,对明代的“去正统化”的外交态度也逐步显露出来。明清易代之后,朝鲜燕行使节对宗主国的认同更发生了

\* 收稿日期:2013-10-08

作者简介:宋玉波,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2013年度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朝鲜王朝中华认同观的礼学建构”(2013QNZZ12),项目负责人:刘勇恒。

急剧而复杂的变化，大中华的身影在这些精英的视野中渐行渐远。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燕行使节群体对华态度在“礼义之变”与“中华之殇”的双重作用下形成巨大的失落感，从而促使明末以降，朝鲜在与中国的对视中，颠覆了原来推崇华夏而以“小中华”自居的华夷观念，一边视宗主为蛮貊，一边视自我为正统。

## 一、晚明华制渐失正统，朝鲜俨然“礼义之邦”

李氏朝鲜对明朝的“事大”、“慕华”政策在开国时便已确立，故乐自称“上国之属邦”；而明朝对“入贡尤谨恪，为诸国之最”<sup>[1]</sup>卷9《外志》，p673的朝鲜也给与了优渥的待遇。其稳定的藩贡关系、在东亚国家体系中重要政治地位以及对中华制度的基本态度，可以从明代来华使节所著录的《朝天录》、《朝天日记》中体现出来。从“朝天”到“燕行”，表明朝鲜使节对华态度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其认同观递嬗的苗头应当定位在16世纪，而17世纪中叶的政治遽变只不过是加剧了这种变化。中国学界对中朝关系的研究大多局限在清代，且将明亡清替作为朝鲜对华政治认同的一个分界点来讨论，认为朝鲜人对明帝国是全面的认同<sup>①</sup>，这样的观点是有待商榷的。实际上，日本学者夫马进(Fuma Susumu)已经提醒学界注意，早在明朝万历二年(1574)，朝鲜王朝对华态度的转变以及对“小中华”意识的放弃，就已经逐步显现出来，同时朝鲜对明的批判也的确值得引起重视，只不过他的研究假设是建立在许葑(1551—1588)、赵宪(1544—1592)两位使者的“朝天”记闻之上<sup>②</sup>。许葑、赵宪分别学宗朝鲜大儒退溪先生李滉(1501—1570)、栗谷先生李珥(1536—1584)，是朝鲜文人中的精英，他们的学识与见闻在朝天使中也极具代表性，此二人对明朝的印象如“风俗之荒如此”、“典卖子女以偿赋税”、“名为中国，而其实无异于达(鞑)子焉”、“假公济私、殃民坏法”、“谁谓礼义之邦乎？”等批判屡见于其记闻之中，可见其对中华的印象远没有想像中那般完美。惟其如此，朝鲜对晚明政治腐败、民心涣散、崇佛重道、丧制紊乱、程朱理学没落等全方位的批判常见于使节笔下，他们认为大明王朝晚期的“中华国”已并不那么纯正，甚至几不如朝鲜。

早在明弘治元年(1488)时，使节崔溥(1454—1504)便已经注意到了这种现象，他在《飘海录》中说中国尚道崇佛之俗，举国皆然，让人怪叹。使节黄汝一(1556—?)也记录了一些怪诞现象：“大概丧礼顿废，埋葬无法，死而棺敛者不多，棺而埋窆者绝少，窆而阶砌者尤无。其亲、其夫死，则出置棺于野田中，或仅盖苫荐，或暂涂棺面而已，是必北俗习染夷虏之致也。”<sup>[2]</sup>卷10《银禧日录》，p308李押(1737—1795)曾总结说，明代火葬、崇佛的陋俗，多是因为古礼陆沉，皇明不能矫革。他甚至将清代崇佛之风也归结于因袭明朝，“明祖虽曰尽复中华之制，实则金元胡风”<sup>[3]</sup>87，所以对于以古礼为正统的朝鲜文人来说，大国的这种做法也让他们“至今追恨”。

嘉靖十六年(1537)，书状官丁焕(1497—1540)随朝鲜使团于8月24日抵京，10月5日返国，使团在京42天时间里，丁氏发现嘉靖皇帝竟然只临朝一天。更难以接受的是，明朝方面竟然将朝鲜使团安置在玉河馆最为破旧的房间中，且与“鞑子混处一馆”，并限制使节出入，丁氏说道：

余在本国粗涉前史，目历代称美之言，常谓中朝之待遇我使臣，必加礼貌。到今乃与犬羊共闭一圜，腥膻之气袭体熏肤，此实从前通事等沉酣珍货，心迷目眩，恣肆忘返，至于奉命使人辄丧行检者，往往有之。<sup>[4]</sup>卷2《朝天录》，p100

万历三十八年(1610)，考虑到辽宁掌印都司许光祖刚病死不久，使节黄士祐(1486—1536)与书

① 例如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有孙卫国：《〈朝天录〉与〈燕行录〉——朝鲜使臣的中国使行记录》，《中国典籍与文化》2002年第2期。葛兆光：《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中华文史论丛》总第81辑。

② 关于万历二年许葑与赵宪两位使节在华的情报搜集与对华的基本态度，请参看夫马进，「萬曆二年朝鮮使節の「中華」國批判」，收入「山根幸夫教授退休記念・明代史論叢」，（東京：汲古書院，1990），第547-569頁；夫馬進，「趙憲《東還封事》中國報告」，收入谷川道雄編，《中國邊境社會の歴史的研究》，昭和63年度科學研究費補助金綜合研究・研究成果報告書，（京都：京都大學文學部，1989），第53~70頁。中文版并见夫马进：《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使节视野中的中国·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状官在都司衙门呈咨文时,并未着行礼时的盛服,此举却遭到了都司的严厉斥责,都司认为使节有失礼仪体统,并宣称不尊都司就是不尊朝廷,不尊朝廷就是不尊中国,不尊中国也就是不懂得自尊。使节解释称,两百年来使节随班于大庭及衙门均着普服,已成惯例,且掌印都司新丧,不宜着华服来见,并无他意,并表示愿意在回来时行盛服礼,但是仍旧遭到其他都司的刁难与需索,黄士祐不得不感叹道,中国的官吏“理屈词穷,捃摭他辞,欲文其非,可笑!”<sup>[5]</sup>卷5《朝天录》,p483

朝鲜的朱子学与明朝心学在学术上所表现出来的同曲异调,也体现出其在文化秩序上对中国的脱离,万历二年的使节赵宪,曾在蓟州某县乡约仪式上这样评价即将从祀孔庙(赞成从祀一派占据优势)的王阳明(1472—1529):“某窃见其书,多有禅底意思,而又自信太过,虽至圣之言,亦或不取,乌在其为真儒乎?”<sup>[6]</sup>卷11《朝天日记·中》,p208 其根本原因在于陆王之学弃事物、废书册、随意改定章句,肆意诋毁朱子,中国之人,“固滞鄙贱,不可与辨”,且中华之国“邪说横流,禽兽逼人,彝伦将至于灭绝,国家将至于沦亡”,而反观朝鲜,列圣迭起,“虽以我国偏小之壤,而亦得兴于斯文之盛也”<sup>[7]</sup>卷2,p87,可见其痛恨阳明学之深,鄙薄中国人之切。

这也至少证明了两种鲜明的姿态:第一,明代中期以后,程朱理学逐步没落,唐、宋以来的旧制未被“中华国”很好地继承下来,所以中华文明的正统性受到了朝鲜使节的质疑,而这恰又使得以朱子学为正统且代代延续的朝鲜自称“小中华”具有合法性。第二,从对宗主国文化的质疑与批判来看,朝鲜以朱子学建国,俨然“礼义之邦”,使得朝鲜开始脱离“他者”而自我意识逐渐强烈。值得注意的是,学界对清代中朝关系研究的焦点放置在对以北学思想为代表的华夷观的讨论,北学思想主张放弃以朱子学为正统的“小中华”观念而北学中原,但对这个思想根源的起点不应当设置在18世纪,而应该回溯到明代的晚期,因为正是朝鲜对明姿态的渐趋遇冷,才奠定了后来朝鲜中华观这种动态变化的根源。也正是有了赵宪、许葑等人对想像中的中华国的批判,以及朝鲜在明代便逐步自视为“礼义之邦”,所以就不难理解当宣祖大王李昞(1552—1608)在读完质正官赵宪上呈的关于仿效中华制度的八条奏疏(圣庙配享、内外庶官、贵贱衣冠、饮食宴饮、士夫揖让、师生接礼、乡间习俗、军师纪律)后,断然拒绝了赵宪的奏议,他的理由是朝鲜与中华:“千百里外风俗不同,若不揆风气习俗之殊,而强欲效行之,则徒为惊骇之归,而事有所不谐矣!”<sup>[8]</sup>卷25《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七年十一月癸酉》,p1510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在赵宪之后,朝鲜便停止了派质正官去中国打探情报。

## 二、王纲坠而蛮貊起,中华认同感沦丧

17世纪中期以后,中朝关系中的思想史研究集中在对华夷观的讨论,其中又以对北学派的讨论最具代表性,这一研究的推进得益于韩国学界对朝鲜来华使节见闻录——《燕行录》的编纂<sup>①</sup>,这使得晚近以来诸多研究成果崭露头角:陈尚胜分析朝鲜使节从“朝天”到“燕行”、从“事大论”到“华夷论”再到“北学论”的对华姿态转变进程<sup>②</sup>;葛兆光以燕行使节对明清衣冠的考察和对清代士人的笔谈为切入点,认为朝鲜在建构文明主体性的同时解构了清代的中华正统地位,提出了17世纪以后东亚共同体的概念已经渐趋消解的核心观点<sup>③</sup>;孙卫国以朝鲜尊周思明态度为背景,考察朝鲜17

① 1960年与2008年,韩国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所先后编录《燕行录选集》2册与《燕行录选集·补遗》3册,1976年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又编录了《国译燕行录选集》10册,2001年与2008年,韩国东国大学校大学林基中教授又先后编录《燕行录全集》前100册约380篇及《燕行录全集·续集》50册约107篇;此外,林基中与日本京都大学夫马进教授又合编了《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3册。

② 陈尚胜:《朝鲜王朝(1392—1910)对华观的演变——《朝天录》与《燕行录》初探》,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③ 葛兆光:《大明衣冠今何在?》,《史学月刊》,2005年第10期;葛兆光:《再谈十七世纪以来中国、朝鲜与日本的相互认识》,《东亚文化交涉研究》,别册1;葛兆光:《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中华文史论丛》总第81辑;葛兆光:《关于朝鲜、日本文献中的近世中国史料及其他》,《复旦学报》2008年第2期;葛兆光:《朝鲜使者关于季文兰题诗的两百年遐想》,《中国文化》2006年第1期;葛兆光:《清代中叶朝鲜、日本与中国的陌生感》,《书城杂志》2004年第9期。



世纪中叶至 19 世纪朝鲜“小中华”意识的变化过程<sup>①</sup>；韩国学者刘奉学、崔韶子、姜在彦、尹景喜、宋美玲等人重点考察北学派代表学者在朝鲜的形成过程以及 17 世纪前后对清国交流的基本态度演变<sup>②</sup>。

17 世纪中叶，中国政治舞台的主角由汉族转为少数民族，随之而来的是以华夏礼制为代表的“正统文化”与满清“夷狄文化”的紧张、冲突与调适。清初，“胡风”借助政治的力量欲将整个中国满化，但面对政治与文化的双重高压，中华文化表现出了异常的强大与坚韧。经过一个时段的磨合，汉礼满俗渐行渐近，糅杂一处，政治上的华夏正统甚至为满清所因袭继承。各种习俗如服制、礼乐、信仰等亦渐变得满汉不分，尽管在汉族群体当中仍旧有抵触，但总体上却趋于温和。然而，面对“大中华”世代更替的大变局，朝鲜人在文化心态和政治归属上都显得异常的尴尬。朝鲜长久所因之唐宋旧制，所朝大明之君，不期被其所鄙夷的“单于国”所取代，这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现实中都难以接受。面对明纲坠毁，清夷崛起，朝鲜虽有匡扶之心，却力有不逮。

如果说朝鲜对满清蛮俗在一定程度上抱有批判心态的话，那么，朝鲜在对华夏正统文化承续上的优越感，似乎又加剧了他们对满清文化的鄙夷与不屑，坚持大明衣冠的朝鲜士大夫对汉人所着满人服制的批判便是绝好的证明。明清易代后，清人入主中国，限汉人剃头改服，朝鲜则依旧保留明代冠服，这种做法的用意，一则表示朝鲜愿固守先王法服，承续华夏正统，一则是对新宗主国——清国在文化与习俗上的不相妥协。由于服制的差异，使得燕行使节们每每来到中国后，总被满人哂笑其所穿着如“戏子”一般，对于满人的无知与轻视，使节们则认为“性甚顽愚”，不无鄙夷之意，而对于那些“何处是江南”、受满人统治欺辱的汉人，使节总会有意无意地在交谈中揭开他们内心深处国破礼失，苟全性命，臣服清鞑的伤疤。在中国访问期间，多数使节会主动找到汉人，故意问他们“我们衣冠见得可骇不骇”之类的问题，而当有汉人主动上前围观并发出“老爷们衣冠甚可爱，我明朝衣冠是这样”这般赞叹时，使节们不仅会洋洋得意，更会反问汉人“你们所着衣冠非旧制否？”得到的答复几乎千遍一律的是“此是鞑子打扮”、“吾之祖先亦曾着如此衣冠矣！”给出这般答案的汉人，几乎都是在清国高压的政治之下不敢稍有反抗者，而那些敢于在朝鲜使者面前说真话的汉人，也无不表现出对明亡清替的无奈与痛惜。赵荣富（1672—1728）曾和一位井姓的汉人教授聊起大明服制，赵说此番入京师，着纱帽、团领、品带，让大国之人感到不无骇异，井的大胆回答与主动请求却让赵颇感意外：“吾则只见其可敬，未见其可骇，吾之所着服色，诚可痛也！吾欲随你们去，贵国王肯容接否？对曰：“岂不容接？而但君之随去似未易矣。”<sup>[9]332-333</sup>而金昌业（1658—1722）在燕行途中与一位十五岁的汉人童子张奇谟的对话，似乎更能体现出朝鲜对自身尊奉正统的优越感以及对沦为“左衽”的哀痛之情：“你少能知夷狄、中国有别，可贵，可悲，高丽虽曰东夷，衣冠文物皆仿中国，故少有中华之称矣。”<sup>[10]卷1, p354-356</sup>

此外，使节们发现，清代的学术也乏善可陈，童幼所学的课业当中，竟然不再有朱子小学一门，清代读书人竟然连《读礼通考》的作者是谁都不知道。金景善（1788—？）曾说，清代的汉人知识分子中，虽有陆陇其、李光地的学问，汪琬、魏禧、王士禛的文章，顾炎武、朱彝尊的传识，但是这些人一旦剃发便成了清国的“胡虏”，而胡虏与犬羊之类等同，“吾与犬羊也，何观？”<sup>[11]374</sup>

文化与学术上的失落导致政治认同的衰减则是必然的结果。俞拓基（1691—1767）曾记录乾隆发布的一道旨意，大意为盛京乃满清之根本，关系至重，但乾隆巡视盛京时发现，乌喇官员竟然几乎

① 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的研究（1637—1800）》，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孙卫国：《〈朝天录〉与〈燕行录〉——朝鲜使节的中国使行记录》，《中国典籍与文化》2002年第1期。

② 刘奉学：《燕岩一派北学思想研究》（首尔：一志社），1995年；崔韶子：《18世纪后期朝鲜知识人对中国的认识——以〈燕行录〉为中心的考察》，《国史馆论丛》1997年总第76辑；姜在彦：《韩国实学中的北学思想——近代开化思想的萌芽》，载《思想》，岩波书店1969年版；尹景喜：《十八世纪初庄洞金氏的燕行体验——以金昌集〈燕行坝笈录〉为中心的考察》，《汉字汉文教育》2007年总第19辑；宋美玲：《想象中的中国：十八世纪朝鲜知识人认识中的清朝统治》，收入崔韶子教授退休论丛刊行委员会：《东亚历史中的中国与韩国》，（京畿：西海文集），2005年。

都用汉语而不用满语，大有渐入汉俗而抛弃清制的意思，皇帝感到万分忧心，飭令地方官员严加议处，这让俞拓基无比反感。而早在雍正二年(1724)时，燕使权以镇(1668—1734)就已经清醒地看到清国纪纲腐败、律令松弛之弊，在他的《燕行日记》说到：

康熙之末，纪纲已坏，即今尤甚，贵臣对君唾涕，小臣入班不拜者有之。州县官亏空者多至数百万，少不下十余万。哈密用兵已二十年，胜败不常。年羹尧，宠妃之兄，握重兵于外；克隆多，母族也，总首务于内，若尚明者，弄臣也。尽夜游戏而一月三五日视朝之制，已是太阔，而近来无一日视朝，其政可知也。汉人与清人常立党，相恶相憎，康熙虽调停，而汉人见我人，全谈清主之恶，见清人来则默而起去云。<sup>[12]</sup>卷8《燕行日记》，p133-134

更进一步地说，清国皇帝大多傲然自圣、以矜高为事，乾隆则全以畋猎荒淫为事，而即便连康熙这般勤政的君王在他们眼中也不过是守成之君，其政治皆因顺治法度，“终是戎狄”<sup>[3]</sup>158、“性甚苛躁，政多猛急，喜怒无常，赏罚过中，大官之非辜被罪者既不少，而小官之无功骤升者亦多，人皆嗟怨”<sup>[13]</sup>246、“深居九阙，专事荒淫”<sup>[14]</sup>271。如此一来，使节们对清国的厌恶与批判，不但促使他们眼中中华制丧失了正宗地位，而且加速了对中华认同的消解。

### 三、悲情与宣泄：燕行使节的诗性“正义”

17世纪中期清取代明而成为东亚的宗主国后，朝鲜和清国的关系仍依旧例通过朝贡维系，一代又一代的使节们须按照既有的路线，于每年10月出发入京面圣输贡，次年5月返回朝鲜(也有临时使)。使节在访问清国期间，几乎都会以不同的体例记录下在清国的见闻作为情报回馈给朝鲜朝廷与国王。作为朝鲜优秀的文人与士大夫，使节们除了记录所见所闻所感之外，更以诗歌抒发个人情感与民族情怀。在前赴后继的朝鲜士大夫的胸臆中，那些抒发异域悲情的诗篇正是文化失落感与政治离心力的绝佳抒发。对于使节们来说，了解人文风俗、刺探中国情报是其来华的基本使命，但是此时的中国在朝鲜士大夫眼中已被蛮夷之邦玷污，多数朝鲜使节难免感慨“永抱偏邦痛，胡为此地来”<sup>[9]</sup>226，他们因此并不乐意忍受风沙万里、背井离乡来到“诸夏陆沉、九州腥秽，有浮于胡元之世”的清国<sup>[15]</sup>《总要通论》，p4，在热血故土与悲情中原两相比照之下，使节们的诗句自然平添不少悲凉之意。康熙五十一年(1712)金昌业随伯氏赴燕，在途经沈辽时，他十分思念自己的家乡，又加之时刻感念中原无土，华夏左衽，由此胸中莫大怆痛，遂赋韵一首：

随人渡辽水，携剑向燕云。侠窟悲无士，穷庐耻有君。百年犹左衽，四海尚同文。何日夷风变，中原脱鹿裙。<sup>[16]</sup>《燕行壘麓录·次伯氏孤家子述怀韵》，p27

在将要离国赴清，或并未真正达到清国时，燕行使节和他们的歌诗更多地处在一个对异邦的想像当中，正是在口耳相传中，很多观念会变得先入为主。李器之(1690—1722)在离开朝鲜时，曾作诗三首，把自己的悲壮离开想像成在易水边从容蹈死地的荆轲以及柴市中英勇就义的文天祥，更将他自己想像成为唐太宗征伐高句丽时一箭射瞎李世民而迫使唐军撤退的凤城守将杨万春：

闻说胡皇鬓已斑，中原豪杰百年间。车攻吉日今无望，倘有真人起草间。安市城中杨万春，腰间白宇破强邻。

黄云古堞英灵在，应笑三韩奉币臣。<sup>[17]</sup>卷1《燕行诗·送人赴燕·其二》，p292-293

能否恢复明朝统治一直是燕行使节关注的焦点，在燕行使节的诗句中，待明朝复生的诗句颇多，例如李颀命(1658—1722)曾说：

崇祯嗟如晋义熙，剥阳犹待复生期。人间岁月初周甲，天下衣冠久化夷。大统今成西国历，明堂谁见汉时仪。

年年颁朔三韩耻，燕土逢春泪更垂。<sup>[18]</sup>卷1《燕行诗·次副使见新历有感韵》，p91-92

朝鲜使节在痛恨清朝窃据中华的同时更加同情汉人家国沦丧的遭遇,两百多年中,前赴后继的朝鲜士大夫一直关注那个因受满族军官欺辱的汉族题诗女子季文兰,便是佳证<sup>①</sup>。

季文兰原籍江西,自称南京苏学士之女,康熙戊午年(1678)因吴三桂之乱而为一王姓满人章京虏至沈阳,季氏女在途经河北丰润榛子店时,感念身世凄惨,以左手题诗一首于壁上曰:

稚髻空怜昔日妆,征裙换尽越罗裳。爷娘生死知何处,痛杀春风上沈阳。<sup>②</sup>

榛子店是朝鲜使节入京必由之地,季氏题诗后不到半个世纪,这一故事便在朝鲜国内传播开来,并被前赴后继的燕行使节们反复联想,其时间跨度竟然长达两百年。最先发现该诗的是康熙十九年的陈奏使申晷<sup>[19]481-482</sup>,继而金锡胄(康熙二十一年)<sup>[20]卷6《摘椒录·上》,P26-27</sup>、李颐命(康熙四十三年)<sup>[21]卷1《燕行诗·榛子店次副使次季文兰韵》,p88</sup>、金昌业(康熙五十一年)<sup>[16]《燕行塌览录·榛子店次季文兰韵》,p36</sup>、李宜显(康熙五十九年、雍正十年)<sup>[22]卷29、卷3《庚子燕行杂识·上》、《壬子燕行诗·漫赋归途景色二十叠·榛子店》,p8-9、p319</sup>、韩德厚(雍正十年)、李喆辅(乾隆二年)<sup>[23]345-348</sup>、朴趾源(乾隆四十五年)<sup>[24]卷11《热河日记·避暑录》,p280</sup>、沈乐洙(乾隆五十一年)、洪世泰(嘉庆三年)<sup>[25]174</sup>、姜浚钦(嘉庆十年)<sup>[26]《文兰愁》,p46-47</sup>、泉九万、游荷、姜时永(道光十年)<sup>[27]卷2,p107-110</sup>、金景善(道光十二年)、崔秉翰(同治元年)<sup>[28]263</sup>、林翰珠(光绪二年)<sup>[29]178</sup>等十余使节先后在榛子店季文兰题壁诗后“次其韵”,且无一例外地载入他们各自的文集中,并在朝鲜国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将要赶赴北京的朝鲜士大夫也恰是在读过前代使节的《燕行录》后才刻意地前往榛子店寻找季氏女故事的踪影。例如金昌业、李宜显(1669—1717)、李始源(1753—1807)、朴趾源(1737—1805)等人都是在早年读过金锡胄(1634—1684)《息庵集》中的诗句后欣然前往找寻季文兰的影子。李喆辅(1691—?)去到榛子店时,就连客店的老人也不曾知道季文兰事件的具体细节,但他依旧对季文兰干戈飘荡而不能自守的遭遇牵肠挂肚,他在日记中多加揣测季文兰的身世,说季文兰出身高贵,翩翩乎有女骚之风,其身姿则娇姿软质,其名节则刚烈自守,此等女子不免为清夷所迫,不克自守,为风尘所侮,着实让人扼腕。

一个素未谋面,只能停留在诗句与想像中的异邦女子的遭遇,得到了朝鲜知识分子200年的悲情祭奠,他们除了怀着一颗对异邦风情人物的好奇之心,更有着知识人独有的见微知著、悲天悯人的敏锐,从他们的诗句中,可以读到来自“礼义之邦”的知识分子对季文兰这般柔弱女子凄惨身世的同情和惋惜,但将一代又一代题诗使节的种种举动串联到一起,则不难发现除了同情之外,尚有对清虏蛮夷之性的切齿痛恨。纵观《燕行录》中的诗集,多数都在描绘这种异域的悲情,有些在顾念前明中朝的旧事,有些在暗讽满清政治的蛮貊之质,也有一些在以自居正统的姿态指斥中国的人与事。不难看出,“鸠占鹊巢”的认知始终成为一道不可磨灭的成见,深深地刻画在明亡后朝鲜使节的中华观之中。

#### 四、臆想与镜像交叠,“礼义”与“蛮貊”易位

考察17世纪之后的《燕行录》不难发现,燕行使节想像中的文化、民族与国家同他们笔下的清国实际上呈现出并不一致的镜像,这固然是政治归属迷失后国家间认知的表达,更反映了燕行使节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所表现出来的行为特征。这一群体兼具儒学家、文化精英、使节、诗人、卫道士等多重身份,他们对中国的认识,自然也呈现出多重的镜像。多数的使节在面对清国的政治与文化时多抱有复杂的心理,既要迫于大国压力而维系传统的宗藩关系,又要不约而同地解构对宗主国政治文化及自身朝贡身份的认同。从诸如“伤心万历陪旧臣,今日胡庭拜跪身”<sup>[23]《次副使韵》,p369</sup>、“弱国甘为鬻人役,皮币连连事强邻”<sup>[30]卷3《壬子燕行诗·漫赋归途景色二十叠·皇都》,p325</sup>、“礼乐吾东箕圣国,当时夫子欲乘桴”<sup>[31]《太学》,p17</sup>等燕行

<sup>①</sup> 关于榛子店季文兰壁题诗的研究,参看李登容:《季文兰题壁诗研究》,《中国学研究》2012年第61辑;葛兆光:《朝鲜使者关于季文兰题诗的两百年遐想》,《中国文化》2006年第1期;杨海英:《朝鲜士大夫的“季文兰”情结和清初被虏妇女的命运》,《清史论丛》2007年号。

<sup>②</sup> 季文兰诗句后有题跋:奴江州虞尚卿秀才妻也。夫被戮,奴被掳,今为王章京所买,戊午正月念一日洒涕挥壁书此。唯望天下有心人见此怜而见拯,奴亦不自惭其鄙谤也。吁嗟!伤哉!伤哉!奴年二十有一,父季某,秀才;母陈氏;兄名国,府学秀才,季文兰书。

诗句中,也可以读到朝鲜士大夫们在这种不对等的镜像中表达出来的卑屈与无奈。

燕行使节们的清醒之处在于,他们并不只是记录在中国的见闻,更重要的是他们善于将中国与朝鲜进行比较,举凡山河城郭、礼乐文教、饮食起居,在他们看来,原本最为熟悉最为亲切的故地会变得那么陌生而让人惊奇,在念旧情结的驱使下,尽管他们也知道中华之物力绝非偏居东隅的朝鲜可比,但一旦提到“中华”,他们便会油然而升起一种固执的高傲之情。在他们看来,中国得有今日之祸,中原皆堪恸哭,而朝鲜自有唐、宋以来遗留下来的光辉,这种感性经验的得来,自然与他们固执的华夷观有莫大关系,但更多的恐怕是他们依旧停留在一种“季文兰式的臆想”当中。多数的燕行使节在真正体验中国之旅前均读过前辈使节所著录的《燕行录》,作为使节群体固有的价值观会先入为主地影响他们的判断力。赵荣福曾和一位清国通官之子交谈,见其人对使节一行十分客气,便问道,“俺们所见胡人皆蠢顽无礼,为何汝独如此者”,当他们得知通官之子也是朝鲜人之子孙、故而有礼时,赵得意的在日记中写道“岂见闻吾东礼法而然耶?可叹!”<sup>[9]235</sup>李基宪(1763—?)曾与一位清国乡贡进士齐佩莲交谈,李故意问齐道:“我国之人敦尚礼义,非洛闽之书不读,中国亦认我国乃礼义之邦否?”齐谦恭地回答说:“寰宇之中,属贵东为众邦之冠。”<sup>[32]卷1, p104-105</sup>

从朝鲜使节的这种态度可以看到,此时的藩国之于中国,已经产生了或强或弱、或多或少的摩擦。这些摩擦更多地来自于这些知识精英的体验与总结,不过在这种摩擦中也不可避免的掺杂着臆想与武断。18世纪的中叶,韩德厚(1732—?)在游历完中国回到朝鲜后,对其国王说出别有一番心意的话:

清入主中国已近百年,以其运则将穷矣!升平既久,朝野狃安。穷奢极欲,靡有限节。贪渎成风,上下征利。贿赂交凑,全没廉耻之心。……有匹夫一呼,四海土崩之势。成败兴亡,虽不质言,参以事势,不出十余年,必有事变。”<sup>[14]271-272</sup>

事实上,在韩德厚之前与之后的燕行使节的归国报告中,庶几都有类似的言论,一方面,这既说明镜像中所反映的自我与真实的存在差异,另一方面也说明,这种偏激的感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群体的认同偏好。需要加以辨别的是,中华认同观的递嬗可以理解成为政治合法性的危机,但对这种危机的认识,全然在于体验者自身的感知,感知(Experience)也并非全然真实与公允,虽然它是认同(Identification)的有效表现形式,但二者之间却又不能全然划等号。具体来说,朝贡体系下的认同观是长期、复杂、动态的过程,换言之它并不是《燕行录》文集中的个人情感的全部写照,且这些个人情感还包含了偏见、责难甚至是非理性的敌对情绪。当然还是有部分使节用冷静的思考代替了偏执的民族主义,俞彦述(1703—1773)在他所搜集到的情报中没有忘记提醒朝鲜注意清国的军事实力:

我国兵力自前非不强勇,而只是人心自来多谋而且怯。自丙子败衄之后,一闻胡来,则便皆畏怖思走,未敢为争战之计,尝闻丙子年有一胡驱我人三十余名而斩之,云其畏怯可知。<sup>[33]卷6《燕京杂识》, p338</sup>

在韩德厚与俞彦述所代表的两种外交思想之间,颇有战略眼光的金景善在给国王的奏对中提炼出了北学思想的雏形,金氏总结了中朝关系中针对使节的“五难”与针对中州人士的“三难”,他认为中州人士固有可责难之处,但是那些在文集中诸如“中土不见文章”、“燕赵之市未见悲歌之士”、“以外藩之土姓陵中国之旧族”、“独以一撮之髻自贤于天下”等激进、自大的言论同样值得批判。正是在这种臆想甚至是失真的镜像里,金氏很清醒地认识到中、东之间的差别,所以他别具眼光地勾画了北学的思想雏形:“今人诚欲攘夷也,莫如尽学中华之遗法,先变我俗之椎鲁,使吾民足以制梃以撻彼之坚甲利兵,然后谓中国无可观也。”<sup>[34]376-377</sup>如果说韩德厚之人的观点只是一种偏激的呐喊,且这种歇斯底里并无助于脱离藩属身份的话,恐怕17世纪后的东亚国家,正是在金景善这种思想的浸润下,逐步地摆脱满清所鼓吹的天下主义的阴影。

## 五、结 语

《燕行录》先后由数百位朝鲜使节写成,时间跨度长达 500 年,是研究明、清、朝鲜三者关系的重要域外史料。一国的使节通常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声音与形象,他们在异邦的见闻及其表达,往往也成为两国间关系的风向标。朝鲜对华姿态的转变表明,明代中期以降,中国对藩国的吸引力或藩国对中华的认同观在逐步地变弱,这实际上为后来的北学思想替代即将过去的“小中华”思想更向前推进埋下了伏笔,这也是研究传统东亚国家间关系的学者容易忽略的要点。明清易代更如同一次政治的大地震,尽管满清用“以夷变夏”的策略维持着东亚之间的朝贡体制,但这并不能改变早已根植朝鲜人内心深处的“礼义”与“蛮貊”之辨,《燕行录》正反映了燕行使者所确信的“礼义”与“蛮貊”的政治行为体身份互换的事实。朝鲜对华的姿态的区分使得明末之后的东亚国际关系表里不一,就自身而言,是从“小中华”到“礼义之邦”的自我身份重构,就他者而言,是文化沦丧到“蛮貊之邦”的认同迷失与解体。其根本原因在于,朝鲜始终处于相对单一、封闭的环境中,明朝初年朝鲜开始大规模的儒学化,儒学成为了文化生活与政治制度的根基,加之北学思想的逐步浸染,程朱理学的朝鲜化进路实质上是对中华“正统”的全面继承,而同一时期的中国,正统的中华制度正受到商品经济萌芽与华夷之辨的冲击,而政治上的“父子关系”被夷狄的入侵所截断,两相对比之下,便有了本质不同的华夷观。不过对于“蛮貊”的定义,源自于特殊的国家间关系,又始终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从更广、更远的历史路径来看,东亚近代化的原因并不全然在于过去学者所说的冲击与回应,而更是因为有了被视为蛮貊的清国所维持三百年朝贡体系内部催生的自我消化与认同迷失,使得东亚的传统国际关系名存实亡,东亚的近代化才有了内在的动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蛮貊”的定义显然是不符合历史正义观的。

### 参考文献:

- [1] 毕恭. 辽东志[M]//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2] 黄汝一. 海月先生文集[M]//燕行录全集,卷 8. 首尔: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下同,不注).
- [3] 李押. 燕行记事[M]//燕行录全集,卷 53.
- [4] 丁焕. 桧山集[M]//燕行录全集,卷 3.
- [5] 黄士祐. 桧山世稿[M]//燕行录全集,卷 2.
- [6] 赵宪. 重峰先生文集[M]//燕行录全集,卷 5.
- [7] 许蔚. 荷谷先生朝天记[M]//燕行录全集,卷 7.
- [8] 吴晗.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9] 赵荣福. 燕行录[M]//燕行录全集,卷 36.
- [10] 金昌业. 燕行日记[M]//燕行录全集,卷 31.
- [11] 金景善. 燕轶直指[M]//燕行录全集,卷 72.
- [12] 权以镇. 有怀堂集[M]//燕行录全集,卷 35.
- [13] 韩泰东. 两世燕行录[M]//燕行录全集,卷 29.
- [14] 韩德厚. 承旨公燕行录[M]//燕行录全集,卷 50.
- [15] 吴庆元. 小华外史[M]. 朝鲜高宗 5 年木活字刊本,1868.
- [16] 金昌业. 老稼斋集[M]//燕行录全集,卷 34.
- [17] 李器之. 一庵集[M]//燕行录全集,卷 37.
- [18] 李颐命. 踈斋集[M]//燕行录全集,卷 34.
- [19] 申晟. 燕行录[M]//燕行录全集,卷 22.
- [20] 金锡胄. 息庵集[M]//崇祿纪元后 70 年木活字刊本,1698.
- [21] 李颐命. 踈斋集[M]//燕行录全集,卷 34.
- [22] 李宜显. 陶谷集[M]. 朝鲜英祖 42 年年木活字刊本,1766.
- [23] 李喆辅. 燕槎录[M]//燕行录全集,卷 37.
- [24] 朴趾源. 燕严集[M]//燕行录全集,卷 53.
- [25] 徐有闻. 戊午燕录[M]//燕行录全集,卷 62.
- [26] 姜浚钦. 燕行录[M]//燕行录全集,卷 67.
- [27] 姜时永. 轡轩续录[M]//燕行录全集,卷 73.
- [28] 崔乘翰. 燕槎从游录[M]//燕行录全集,卷 78.
- [29] 林翰洙. 燕行录[M]//燕行录全集,卷 78.
- [30] 李宜显. 陶谷集[M]//燕行录全集,卷 35.
- [31] 赵显命. 燕行录[M]//燕行录全集,卷 38.
- [32] 李基宪. 燕行日记[M]//燕行录全集,卷 65.
- [33] 俞彦述. 松湖集[M]//燕行录全集,卷 39.
- [34] 金景善. 燕轶直指[M]//燕行录全集,卷 72.

责任编辑 张颖超